

書名：《中國詞學的現代轉型》

作者：陳水雲

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3月

時代轉換與詞體演進能引領詞風與詞學轉向，是推進詞與詞學史發展的兩大要素。元代後詞體渡過了萌芽期、鼎盛期與衰變期，進入漫長的平穩發展期，從而使時代轉換在推進詞學史發展上所占分量更重。晚清民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劃時代變革，給詞學注入新風，催生出現代詞學，堪稱詞學史上最具有衝擊力及主導力的時代變革，從中可概見古今文化演進的軌迹。對時代特色及價值的客觀定位是需要距離和機緣的，對於近現代詞學，近代學者因“身在此山中”而難見全貌、難得客觀，建國之初又因意識形態關係而缺乏關注、有欠公允，直到近二十年來，研究價值才逐漸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恰當的研究，施議對《今詞達變》、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曹辛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詞學卷）、曾大興《20世紀詞學名家研究》等論著相繼問世。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越發認識到斷代研究傳統的缺陷：往往聚焦於時代轉變完成時的階段性結果，而忽視轉變進行時的動向及動因。然而，在詞學發展過程中，傳薪與傳新——善因與善創總是相輔相成的。時代轉換能成爲影響詞學史發展的要素，正因其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動態過程，發揮著承前啓後、別開生面的樞紐作用，不瞭解新舊學術間的傳承與轉變，便難以界定結果是否創新，創新程度與價值如何；更重要的是，相對於莫衷一是、瞬息萬變的結果，原因更具普適性與啓發性。因此，用動態眼光把握詞學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動因，已成爲大勢所趨。

武漢大學的陳水雲教授是率先意識到現代詞學研究價值的學者之一，在21世紀初已開始從事相關研究；也是率先突破斷代研究傳統的限制，採用轉型研究新視角的學者之一，近十年來都致力於“中國詞學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課題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於近期出版的《中國詞學的現代轉型》一書中。書名中最醒目的“轉型”一詞已突顯出研究的新視角,首章開宗明義:“中國詞學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是一種方式和態度:揚棄傳統,走向現代,從對立走向融合。”此種新視角及宗旨,為體察傳薪與傳新間的辯證關係,將歷史片斷連接成完整的歷史奠定了基礎。

相應地,在研究範圍上,以詞學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關鍵時期——1908—1949年為研究重點,只因1908年《人間詞話》的發表是中國詞學開始現代化歷程的標誌,堪作詞學現代史開端;1949年新中國建立引發了意識形態與學術觀念的劇變,堪作當代詞學起點,而期間的40年,“古與今、新與舊、中與西的衝突表現得尤其突出,它既是對傳統學術的繼承,也是對現代學術的建構,今天所認同的一些學術傳統正是在這個時期確立起來的,現在所談的詞學傳統也主要創建在這個時期。”研究中為明辨源流,在闡釋相關概念及現象時,常上溯至古代,如論詞學的歷史追溯至唐五代,論文化世家對詞學的影響追溯至宋代等;在探討現代詞學的影響時,又下延至當代。如論述胡適思想在1949年以後的境遇,俞平伯詞學在當代的發展,《人間詞話》對現當代學者的學術指南作用等。因此,能夠用跨越時代的動態眼光看待詞學史,在明確繼承的基礎上界定創新。

在研究重心上,重點關注更具先決意義與借鑑價值的轉型原因。“‘學術轉型’這一核心話題……過去的相關研究關注的中心是‘是什麼’,而筆者將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為什麼’上,將現代詞學家放在不同的文化語境裏分析,探討現代詞學是如何轉型的及其轉型的路徑……使我們比較清晰詞學轉型的內在動因。”書中所探討的“為什麼”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什麼會出現,即詞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動因;二是為什麼能實現,即詞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方式。

此書不僅採用了順應研究大勢的新視角,更開闢出獨具特色的新途徑。此種新途徑集中體現在結構安排上,不拘於以時代為序,以名家、群體分類的研究傳統,更注重發掘並彰顯現代詞學轉型的動因及影響,以便更好地解答上

述兩個“爲什麼”。

全書共分爲七章，第一章堪稱根基。要解答上述兩個“爲什麼”，首先要辨別詞學的傳統性與現代性，故第一章《現代詞學的新舊交融》，通過論述“詞學”內涵的演變、現代詞學的傳統資源與師承譜系，不僅揭示出現代詞學新舊交融的客觀現象，更總結出判定詞學現代性的可靠標準：如“詞學”與“學詞”分離，不再是詩學附庸，而能與詩學一同納入現代七科的文學分支中；詞學師承與詞派形成從倚重“親緣”、“地緣”，變爲倚重“學緣”；新增了高校、教材、演講、報刊等傳播媒介；廣泛採用輯佚、校勘、彙刊、編年、箋注等科學研究方法來進行文獻整理；運用審美、民族、性別、白話等現代批評標準來研究作家作品等，從而爲界定傳統與現代奠定了基礎。

第二至五章堪稱主幹，是最能體現此書創意與價值之處，正面解答上述兩個“爲什麼”。《大家經典的魅力與影響》（第二章）、《文化世家內部的思想變遷》（第三章）、《現代高等學府的詞學師承》（第四章）、《文學社團流派的觀念更新》（第五章），正是詞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四大主動因，從中可考見詞學現代轉型的方式。這四章次序的編排也獨見匠心，彼此間是交融而非孤立的，暗含著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脈絡：

第二章重點研究了在現代詞學師承譜系中具有宗師地位的三大家：集傳統詞學大成，點燃“現代詞壇的薪火”的南派（傳統派）宗師朱祖謀；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引領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北派（現代派）祖師王國維；“把王國維的‘無聲’革命轉化爲一場有聲有色‘戰爭’”的北派宗師胡適。這三大家顯赫的詞學史地位使其成爲同類研究的熱點，而此書的特色在於轉換視角，將研究重心由歷來最受關注的三大家詞學觀本身，轉向其詞學觀對現代詞學轉型的貢獻及影響，據此梳理了近現代重要詞派、詞人的師承情況，勾勒出現代詞學演進軌迹。

第三至五章的研究主題在此前學界未得應有的重視，此書將其提煉出來作系統研究，可謂慧眼獨識。其中，第三章論述的文化世家詞學傳承，堪稱傳統“親緣”、“地緣”的樣板，而第四章重點論述的現代高等學府則是新型“學緣”的典範；綜合考察家族思想變遷、高校詞學師承，便會發現彼此間相通之

處——中國第一份高等教育學制綱要《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的草擬人梁啟超，建立起新型的文化家族；劉毓盤、俞平伯等由文化世家的新一代傳人，成長為現代高校學生、導師；由從父輩處接受常州派影響，到在高校中接受、傳播現代思想理念及科學研究法，都意味著傳統的傳承模式“親緣”、“地緣”與富有現代性的傳承模式“學緣”間的過渡與融合。

第五章重點論述的文學社團流派是古今詞學傳承共同的媒介，從晚清主盟詞壇的浙西、常州等地域性詞派，到民國後由宗師引領或同道組建，各抒己見、異彩紛呈的南社、滬社等大量文學社團，同樣體現出由倚重“親緣”、“地緣”，變為倚重“學緣”的發展軌迹，在對比中更彰顯出“學緣”這種新型傳承方式的獨到優勢。而新會梁氏一類新型文化世家的建立、現代社團重塑地域詞統的努力、常州派詞學在現代的傳衍與反響，都印證了新舊傳承方式間的關係並非取代，而是革新與共融，直至當代仍是如此。

第六、七章《現代詞學家思想與方法的進步》上下篇，應為枝葉，起到補充論證，令根基更穩固、主幹更豐滿的作用，可按需增刪。鑑於現代詞學名家眾多，且此前相關研究一直以名家為重點；此書在代表名家與論述重點選擇上，都體現出強烈的拾遺補闕意識：首先，鑑於現有研究更關注於現代派，第六、七章分別將研究視野落在傳統派的兩大分支——偏重思想建構的闡釋派與偏重文獻整理的考據派上，闡明其具有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特色，適合作為考察詞學現代轉型的視窗，可概見現代詞學轉型的思想史與文獻史。其次，在選擇詞學家代表時，更偏重詞學貢獻為現有研究所忽視的詞學家，如闡釋派的王蘊章、任中敏，考據派的孫人和、趙尊嶽等；對於已成為研究熱點的著名詞學家，盡量選取能彰顯現代性的新視角、新材料來作重點闡釋，如對龍榆生，重點論述其詞學研究中體現的現代品格；對葉恭綽，重點論述其在清詞研究上的成就。若暫無更新、更深的闡釋途徑，則選擇在綜述中闡明其卓越貢獻，而不再作重點論述，如唐圭璋的詞學文獻輯佚、胡雲翼的詞史研究、夏承燾的詞學考據與批評等。因此，雖有欠全面，卻能更好地發揮作者的研究專長，也能為更有創新價值的後續研究預留地步。

逐章看去，宛如一面面鏡子，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反映現代性，解答“為什

麼”。因此，在閱讀過程中，我們會發現詞學大家、名家的身影會頻繁出現在各章節中，用親故同鄉交遊、高校建制開課、立派結社、演講、報刊等多種途徑，在理論闡釋、文獻整理、跨文體研究等不同領域，對詞學現代轉型發揮著重要影響，而其眾多的追隨者更能令其影響在折射、迴響中不斷出新，進一步傳播開來、傳承下去。正可印證此書緒論所說：“‘大家’的意義，並不在於他們的觀點有多麼新穎，他們的方法有多麼科學，而在於他們的思想和方法所散發出來的魅力。他們對於歷史的貢獻，是中國詞學在他們的手中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與轉型。”

而上述新途徑的開闢，又得益於獨到的研究方法，主要以翔實史料為基礎，通過大處著眼與細節還原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研究。所謂大處著眼，即將詞學家與群體放回其共有的時代轉換大背景下與各具特色的原始語境中；所謂細節還原，即在大量原始史料的幫助下，回到歷史的場景中，再現生動鮮活的歷史細節。此種研究方法如同用變焦鏡頭觀照歷史，優勢主要體現在：

其一，能更好地還原史實，並令所論歷史以立體化、形象化、動態化的方式呈現，更具感染力與說服力。如通過《梅魂菊影室詞話》對春音詞社第一次雅集前後經過的細節描述，考證出在學界存在爭議的春音詞社發起人及雅集地點；又如從豐子愷、徐鑄成、陸宗達、錢南揚、梁遇春等北大學生回憶錄中收集了大量史料，再現首位北大詞史教授劉毓盤授課時的生動細節：年近古稀，風流倜儻，造詣精深，博通史實，將用寄託解詞、研究與創作相結合的傳統方式，活用於現代大學的授課與考試中。讓讀者得以用一種如臨其境、聞其聲的方式，領略這位備受學生歡迎的詞學名師風範。再將其放入江山劉氏融合浙、常二派的家學淵源與高校詞曲科目初立的大背景中，便可概見詞學現代轉型的途徑與新舊融合的方式。

其二，能更好地辨別現代性與傳統性、個性與時代性，多角度、全方位地考慮研究對象在詞學現代轉型過程中的淵源及影響。如在明辨孫人和就讀北大的具體時間後，將其排除在現代派譜系之外；在總結清末民初詞選編纂的四種動向後，探討劉永濟唐宋詞選的特色。又如對詞史上首部女性詞選——梁令嫻《藝蘅館詞選》的研究，此前學界對其淵源未做深究，僅關注到其受常州派的

影響，而此書通過對選詞情況的定量分析與詞論、附錄的考察，不僅找出了其受常派影響的切實證據，而且發現其對辛棄疾情有獨鍾，選錄辛詞 27 首，為全書入選詞人之冠。結合新會梁氏的家學淵源，可見這一世家並不拘泥于常派的藩籬，特有的“稼軒情結”也與常派“尊夢窗”的時尚頗異其趣。再將其放入大時代背景中，不僅常州派淵源清晰可見：先由朱祖謀、王鵬運傳給變法運動中的同志康有為，再由康有為傳給學生梁啟超與麥孟華，繼而傳與梁令嫻，這一傳承軌迹再次印證了朱祖謀傳統派宗師的地位及影響；“稼軒情結”也有迹可循：“在清末民初社會轉型之際，中國詞學走過了一個從推崇夢窗到標榜稼軒，從崇尚寄託到重視情感、意境的過程。”現代派領袖胡適就是稼軒風的大力倡導者。可見梁令嫻對辛棄疾詞的偏愛，不僅是家族好尚的體現，還是現代風尚的縮影。

其實，解答詞學現代轉型“為什麼”的過程，也是領悟現代性“是什麼”的過程。通過此書，可知現代性是能順應時需，超越特定流派、師承、意識形態的限制，引發共鳴，推進詞學轉型及進步的因素。然而，在動態發展的歷史中，“現代”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某一時段中，革除積弊的進步觀念，可能因襲為下一時段的俗套；而不合時宜的保守觀念，又可能改造成下一時段的時尚。即如就 1908—1949 年這一詞學史上的“現代”而言，“詞學”與“學詞”分離、“整理國故”思潮的興起能代表現代性，但當今學界卻重新就詞究竟是已死的國故，還是依然富有生命力的國粹展開論爭。可以說，真正的現代性沒有恆定的內涵，只有當下的意義，如何實現跨時代的借鑑，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此書重現的歷史細節中，最讓筆者感動的是編著《稼軒詞疏證》，意在“繼伯兄未竟之業”的梁啟勳，在《辛稼軒先生年譜跋》中描述其兄梁啟超勉力撰寫此年譜，直至生命盡頭的情景：“譜中錄存稼軒《祭朱晦翁文》，至‘凜凜猶生’之‘生’字，實伯兄生平所書最後之一字矣。”這不僅能成為梁氏家族稼軒情結的感人力證，更能令人反思在時移世易之後，究竟有什麼能夠“凜凜猶生”？不是放之四海、歷代而皆準的觀念與方法，而是堅守本真好尚的執著、順應時變創新的眼力和勇氣，以及在傳薪中傳新的努力。

綜上所述，此書能在相關論著成果頗豐的學術環境中另闢蹊徑，特色及價

值可概括為傳薪之道在傳新，知因而後得知音：在廣泛借鑑詞學現代化及當今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苛求面面俱到，不拘於靜態結果，而是著眼於詞學現代化的關鍵環節與現有研究的薄弱環節，通過重點考察詞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動因，明辨傳薪與傳新相輔相成的道理，來把握其中能彰顯現代性、促成轉型、可資借鑑的新視角、思路、材料與方法，堪稱詞學現代化的知音；其本身也現身說法地印證了傳薪之道在傳新，而我們作為讀者，同樣要知因而後得知音，領會其拾遺補闕、指示門徑的寫作動機，借鑑其新視角、途徑、材料與方法，在現代詞學研究中發揚光大。

（作者：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員 王衛星）